

留住历史的血色底版

——南京大屠杀档案成为世界记忆遗产背后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蔡玉高 蒋芳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0月9日发布的消息,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第12次会议经过4日至6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的评审后,决定为《世界记忆名录》新增47个项目,其中包括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

在世界反法西斯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二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的南京大屠杀再次因申遗走入公众视野,在人类记忆中留下历史的血色底版。

长期关注南京大屠杀申遗进程的新华社记者将对读者讲述申遗前前后后的故事,再现历史惨痛的一页,讲述一个城市和一个民族对惨案的回忆和思考,对和平的珍视和祈愿。

迟到的共识

时间流逝,记忆能否长存?

2015年,二战和抗战硝烟散去已经整整70年。

今年,距离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已有78年;距离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已有39年;距离1979年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已有36年;距离1996年,广岛和平纪念碑(原子弹爆炸圆顶屋)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已过去19年……

南京大屠杀在这一年成为世界记忆遗产,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一直推动申遗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听到这个消息后松了一口气,也深深叹了一口气。“这是一个迟到的共识。”他说。

世界记忆工程亚太地区委员会主席、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介绍,根据形态和性质,世界遗产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记忆遗产、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文化景观遗产。其中,世界记忆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延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该项目的目的,是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进行保护,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对照这一目的及另外两大惨案的申遗,推动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之举是十分必要的。”李明华说。

在国际史学界,南京大屠杀事件与奥斯维辛集中营、日本广岛长崎核爆并称为二战史上的三大惨案。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引发中国人民强烈抗议,南京大屠杀历史及相应研究逐渐回归国内舆论。

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芝加哥论坛报》前记者、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在南京待了25天。她随后完成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在1997年连续两个多月被列为《纽约时报》书评最佳畅销书,长时间淡出国际视野的南京大屠杀历史在英语世界重获关注。

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工作最早开始于2009年,作为南京市人大代表,朱成山提交了申遗议案。南京市政府当年便成立了申遗领导小组,正式启动申遗相关工作。2010年,系列文物档案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4年3月,由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提名表。

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市档案局等7家单位联合申报的11组档案,经多方慎重挑选,主要包括胶片、照片和文字材料。这批形成于1937年至1948年之间的历史档案,历史线索清晰、纪录真实可信,档案资料互补互证,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申报档案包括日军当时自拍的屠杀照片,外国友人拍摄的纪录影片、国际安全区中国妇女日记,战后中国政府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调查资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

本战犯的档案,我国司法机构侦查起诉、审判日本战犯档案等。“每一件档案都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真实性和唯一性,对于研究中国抗战史、日军暴行史,有力回应该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日本右翼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朱成山介绍。

残酷的记忆

列在此次申遗的11组档案第一位的,是国际安全区教会所办的金陵女大收容所负责人程瑞芳的日记。她在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的84个日夜里,用3万多字记录下南京城这段凄风苦雨的岁月。

白天,62岁的程瑞芳和同伴们撑起一顶已然千疮百孔的“保护伞”,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们提供庇护;晚上,昏暗灯光下,她用和着泪水的墨水写下一篇篇日记:

“12月11日……今早死去两个小婴孩,一个只有一个多月,是闷死的,一个有三个多月,早有病的……今日大炮打得利(厉)害……”

“12月14日……今日来的人更多,都是从安全区内逃来的,因日兵白日到到他们家里抄钱、强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里都是如此,外边更少,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是青年男子……”

“12月17日……现有十二点钟,坐此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今晚拖去11个姑娘,不知托(拖)到何处,我要哭了,这些姑娘将来如何?”

……

程瑞芳日记记录的,是一场烙印在人类文明耻辱柱上的大屠杀中最真实的场景。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南京城变成人间地狱,30多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与放下武器的士兵被以各种方式屠杀,2万多名妇女被强奸,城内三分之一的建筑被毁。

日记发现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郭必强说:“越读越感觉悲愤,我们的同胞曾经生活在这样恐怖的环境中。”程瑞芳不仅逐日记录下大屠杀期间见闻,日记内容也与此前发现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和《东史郎日记》相互印证,构成受害者、加害者以及第三方证言的完整链条,成为不可撼动的铁证。

翻阅这次作为申遗材料呈送的11组档案,日军坦克、装甲车疯狂地炮击南京城;一片断垣残壁的南京,受辱后痛苦万分的妇女,被汽油烧焦的尸体,街道上、水塘中被日军血腥屠杀的平民……一篇篇文字、一张张图片记录下手无寸铁的平民被人入侵兽蹂躏,也以最直接的方式揭开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的伤疤。

“在人们印象中,申遗更多是要体现文化存在的意义。而这次申遗,是通过展现我们国家与民族惨痛的血色记忆,让全人类警醒侵略战争的残酷,了解维护和平的重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说。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盛鸿认为,南京大屠杀申遗将一国的文献遗产,上升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捍卫人类尊严、珍惜世界和平,需要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曾经经历过战争的人们,更懂得和平的可贵。

申遗档案中唯一一组视频史料,是当时身在南京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的长达105分钟的视频。其中一段,画面里一个身中30多刀的孕妇满身是伤、奄奄一息。她就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

1937年12月,已有7个月身孕的李秀英和父亲躲进了安全区,在一所小学的地下室里栖身。12月19日,三个日军士兵发现了他们,并欲强奸李秀英。她拼死搏斗,脸部、腿部、腹

部共中33刀,后经美国医生威尔逊全力抢救,侥幸存活,孩子却流产了。

战后,李秀英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人物曾在多个场合控诉日军罪行。更曾以高龄之身远赴东京,起诉污蔑她为“假证人”的日本右翼作家。

“大屠杀给母亲带来的伤痛永远挥之不去,她毕生深受折磨。”李秀英的女儿陆琪说。但最让她难忘的是历尽劫难的母亲2004年临终前留下的最后的话——“要记住历史,不要忘记仇恨”。

象征和平的花

一个民族,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记住历史,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当下立身。

日本近年来也接连推出与二战有关的申遗事项,申报项目甚至涉及专门进行自杀式袭击的日本神风特攻队。

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本身和不断增添的历史证据,乃至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日本右翼却在不断狡辩、诋毁,以达到否定历史的目的。

2014年6月,我国宣布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珍贵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后,日方一直通过官方和民间团体对我申遗提出“抗议”。

2014年6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要求中方撤回申请;2015年初,日本宗教团体“幸福的科学”派人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项目秘书处递交申请,以两项目“虚构”为由要求终止申报;

2015年6月10日《产经新闻》报道,福冈市的妇产科医生、80岁的天儿都女士表示,当年将父亲亲生男婴拍摄的“慰安妇”照片作为申遗材料存在版权争议……

在朱成山看来,日本右翼一直把否定南京大屠杀作为否定侵华罪行的突破口,绝非偶然。“一方面南京大屠杀在东京审判中有着突出地位,将二战中的日本钉在了‘侵略者、战败者与和平破坏者’的历史定位上;另一方面,这个二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反人类罪行的典型符号。”

日本右翼势力肆意篡改历史的行径,日本国内有良知的人们同样无法容忍。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以本多胜一和笠原十九司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就成立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对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观点逐一进行驳斥。

松冈环等日本民间友好人士30多年间往返中日近百次,走访了超过300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以及250余名日本兵,将“理解中日历史,与受害者同行”作为毕生的座右铭。

近年来,村山富市、海部俊树、鸠山由纪夫等日本前政要陆续造访南京向大屠杀遇难者致歉……

历史的真相,并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被抹杀。还原真相,历史才能最终走进历史。

大屠杀幸存者、86岁的夏淑琴老人听到申遗成功的消息,非常激动。

65岁时,她曾踏上日本国土,成为战后第一个赴日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

77岁时,因日本右翼作家污蔑她是“假证人”,老人愤慨赴日应诉,并当庭反诉对方侵犯名誉权,终赢得诉讼。

“如今,这段历史终于成为人类共同记忆,意味着国际社会对这段历史真实性的认可。”在南京家中,夏淑琴欣慰地说。

夏淑琴家中橱柜上,一张照片格外显眼:老人手捧紫色花束,笑容灿烂。

“这叫紫金牛,是象征和平的花。”夏淑琴说。

外交部:中方将充分发挥

《南京大屠杀档案》珍贵文献的积极作用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近日表示,中方对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决定表示欢迎,将按照有关规定,确保这些珍贵文献得到保护和传播,充分发挥这些文献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共创未来、捍卫人类尊严的积极作用。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近日表示,中方对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决定表示欢迎,将按照有关规定,确保这些珍贵文献得到保护和传播,充分发挥这些文献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共创未来、捍卫人类尊严的积极作用。

反思历史 珍爱和平

——专访申遗发起人和亲历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

●新华社记者 蒋芳 蔡玉高

从2009年1月提交《关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议案,到2015年10月9日申遗成功。回首近7年的申遗历程,作为申遗最早发起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记者:如何看申遗结果?

朱成山:这是和平的胜利。我们提出申遗,就是为了警醒世界不能再让类似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重演。申遗成功表明,我们的认识也是人类的共识。

我们曾经用各种方式对这段78年前的惨痛历史予以记录和纪念。去年2月,我国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国之名悼念大屠杀死难者,是国内对这段历史认识的更大提升。如今,相关档案成功申遗,表明世界范围内人们对这段历史认知取得共识。虽然这个承认来得晚了一点,但毕竟实现了。这对于30万南京大屠杀亡灵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来说,都是最好的慰藉。

在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背景下,对这段人类浩劫的重新审视,反映了中国和世界对战争最深刻的反思,对和平最真挚的企盼。

档案是真实的历史记载,是留存下来的真实形成的历史资料。南京大屠杀档案成为世界记忆遗产,也说明我们对此的认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段历史通过成为世界记忆遗产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公布、公开,对传承历史、反对谬论、传播真相都有重要意义。

记者:78年后才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有人说这是迟到的共识,您怎么看?

朱成山: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一认可确实迟到了,一是南京大屠杀发生已经78年了;二是世界文化遗产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三是二战史上公认有三大惨案:南京大屠

杀、奥斯维辛集中营、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后两者早在1979年和1996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自23年前担任纪念馆馆长以来,推动南京大屠杀相关历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一直是我的夙愿。我从不太了解南京大屠杀历史,到后来越研究越觉得这段苦难的记忆不仅仅属于南京、属于中华民族,而是需要全人类普遍警惕、传承的历史记忆。

遗憾的是,与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在战后即得到保护相比,南京大屠杀相关遗迹的保存还显得不足。直到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卡门女士到馆参观后郑重建议,将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我顿时打开了视野,找到了方向。

我们对南京大屠杀档案的保护与发掘是十分充分的,这些档案既有外籍证人证言,加害方日本的文物史料,也有受害者证言、国际法庭判决等,历史线索清晰、纪录真实可信,档案资料互补互证,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记者:作为申遗最早发起人,请您介绍7年申遗的历程。

朱成山:2009年1月,南京市第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我撰写议案,并联合其他9名市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关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议案获得通过,也成为了当年南京市人大的十大重点议案。申遗由此提上议事日程。之后,我们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局联合,于2009年4月正式启动申报。当时的名称叫“南京大屠杀史专题档案”,共5组档案。2010年2月,该组档案成功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国家档案局高度重视,并联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



民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参观幸存者照片。

这是历史真相的胜利,是和平理念的胜利。10月9日,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标志着国际社会对这段历史达成共识。

发生在78年前的南京大屠杀是二战史上的三大惨案之一,它不仅将日本侵略者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更给中国人留下百年难愈的耻辱记忆。自上世纪80年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馆后,这段沉痛的记忆逐渐成为国民教育的“必修课”。去年2月,中国更是以立法形式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既然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缘何要在78年后作为世界共同的精神遗产加以记忆、传承?我们为何要记住屠杀?

人类经历了蒙昧、野蛮而逐步走向文明,战争却将人性中的黑暗剥离出来,让文明在野蛮中退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约80%的人口、约20多亿人笼罩在这片黑暗之中。在二战和抗战胜利70周年的特殊年份,将这段惨痛历史上升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为的就是将血的教训烙入记忆,让战争的历史悲剧决不能重演。

中国有史可为鉴的古训。历史的镜子照出的不仅是光明、探索,同样也应照出黑暗、丑恶。这也是世界记忆遗产不应遗忘二战那一页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一些有关战争的罪恶记忆已被载入史册。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已作为纳粹法西斯的罪证之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只有直面人性的黑暗,才能清算恶力的黑暗。为世界保留下战争与屠杀的罪恶记忆,正是为了塑造和激扬人类的良知,维护世界和平。

人类的共同记忆虽然弥足珍贵,但却是脆弱的,每天都有仅存的重要记忆在消失。上世纪90年代,南京市对幸存者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普查,共登记1200余名幸存者,如今在幸存者仅剩100余人!及时珍藏这些记忆,刻不容缓。

英国诗人乔叟说,“若把黑白和善恶放到一处,相形之下,彼此才可可见分明。”在世界的记忆中,记忆文献遗产犹如一面镜子,清晰地鉴出黑与白、善与恶。申遗成功,不仅意味着真实鲜活的个体记忆得以保留和传承,更在于保护人类共同记忆永不褪色的重大历史责任。记住历史黑暗一页,为了人类明天的和平。

的严重罪行,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历史事实。中方申报材料完全符合世界记忆名录的评审标准,特别是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标准,申报程序符合教科文组织有关规定,应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记忆。”华春莹说。

对于有报道称,日本外务省10月10日发布“新闻官谈话”质疑中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指责教科文组织未能保持中立和公平,将要求教科文组织进行制度改革,不再被“政治利用”,华春莹表示,事实不容否认,历史不容篡改。日方有关言行再次表明了其不愿正视历史的错误态度。

她表示,中方数亿日方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切实纠正错误,立即停止对中方申报说三道四和对教科文组织正常工作的干扰和无理纠缠,以实际行动取信于国际社会。

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7家单位,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选取出11组档案进行申报。

2014年3月,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提名表。

记者:我们发现今年提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的项目中有多个涉及二战题材,对此您怎么看?

朱成山:今年是纪念二战和抗战胜利的重要年份。尽管已经过去70年,但战争给人类留下的教训极其深刻、不容淡忘。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无时不在提醒国人乃至世界人民,战争的阴影并未完全消除,必须通过汲取历史教训,弘扬和继承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坚定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反对暴力、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这样才能赢得人类和平发展的生存环境。我想这就是为何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申报二战题材作为世遗项目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记者:申遗成功后,我们在推动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方面还有什么打算?

朱成山:申遗成功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也将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首先,多年来,一小撮日本右翼势力,总是以各种方式否认历史罪行,成为世界记忆遗产意味着世界对南京大屠杀历史已经达成共识。

其次,我们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还将不断深入下去。应该说,在纪念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及国内其他一些高校学者的推动下,我们在对这段历史的宏观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卓著的成绩。下一步,我们将遵循国际史学界的通行做法,加强对微观层面的研究。初步计划从受害者、加害者、外籍证人三个方面细化。从受害者方面,我们准备遴选并调查300户家庭的受害史,从家庭成员组成、每位成员受害经历、对家庭造成的损失等多个方面,将战争创伤更加具象化。

纪念馆已组织相关学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座谈。我们计划在雕塑广场上竖一块世界记忆遗产的石碑。

南京大屠杀史专家驳斥日方无理言论

南京记忆给和平更多启示

●蔡玉高 蒋芳